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 张国良 主编

河南卷

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中国发展传播学

■ 王玲宁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张国良 主编

中国发展传播学·河南卷

王玲宁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发展传播学·河南卷 / 张国良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308-05060-9

I. 中… II. 张… III. 传播学—研究—河南省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717 号

总 序

张国良

大约 6 年前,也就是 2002 年下半年,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简称 CDC)正式启动。其研究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开展一项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旨在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经过反复讨论、细致规划,我们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研究团队,于 2002 年底、2003 年初,分头奔赴全国八个省份,实施了入户调查,同时,还对当地主要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领导访谈。在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后,各团队成员又投入了紧张的统计分析和报告撰写中,经过 3~4 个寒暑的辛劳,陆续完稿,最终交出这样一份总篇幅逾 200 万字的答卷。

回首往事,颇为感慨!这一项目的背景如下:

世纪之交,为了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了一百多个“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评审,由我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被批准为全国传播学科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职责,是持续地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于是,本人申报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被确立为首批重大课题之一。

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发展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因此,诸如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伦理学等,无不构成学科关注的热点。但遗憾的是,由于传播学在中国起步很晚,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基础很弱,短短 30 年里,又历经各种曲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以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传播学,也就一直处于缺失、贫弱的状态之中。

我之所以构想、申报上述项目,初衷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我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不对本土的发展问题予以足够注意,那无疑是失职。而这一项目当年很快就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及专家的审核,则又表明,对发展传播学的重视,业已成为共识。

从时间角度看,2002 年恰好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和实质意义的节点。它是改革开放的第 25 个年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一方面,2001 年底加入 WTO(即“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使中国真正融入了

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2002年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均约8000元，接近1000美元（2003年实现了超越），也就是说，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跨入了小康阶段，并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不仅如此，2002年又处于新媒体大发展的前夜。该年，中国广告业的产值近1000亿元，而整个媒体产业的总产值近2500亿元，总体呈现出蓬勃生长、方兴未艾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新兴媒体已悄然崛起，开始形成对传统媒体的强力冲击，以最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为例，2002年其用户已超过4500万人，跃居世界第二。

综上所述，在此历史关节点上展开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概而言之：

第一，作为历史实录的文献，它通过定量方法，以数据和事实文本的方式，忠实地描述、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中国传播产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状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史料性。

第二，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它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资料，并且给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结论，据此，既可纵向比较，又可横向对照；既可深化认识，又可凝练理论。

第三，作为工作改进的依据，它发现了媒介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不足，诸如：媒介设施的城乡差距显著、重要议题的深度认知率低下、揭露坏人坏事不够有力、反映群众呼声不够充分、品位格调不高等等，其中的绝大部分意见，至今仍不失参考作用。而且，尤需注意的是，除了全国层面上的一些共同症结外，各地的的问题其实又不尽相同，为此，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以一个总报告和八个分报告的形式，加以全面、具体地呈现。

由于这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工作量堪称浩大。就问卷调查而言，覆盖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约4.5亿人口），从最北部的黑龙江省、甘肃省，到最南部的云南省、广东省，从大都市、中小城镇到乡村，纵横以千万里计，跋涉于山水阡陌间，访问样本家庭近3000户、人数逾万。就内容分析而言，选取各地32种报纸（为期两周），合计400多份，统计、分析了约25000条新闻信息。如此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若非得到了各地兄弟院系师生的鼎力支持（动员人力500人次以上），其完工根本难以想象。

在此，作为这一重大课题的总负责人、系列丛书的主编，本人谨向全体为CDC项目做出各种贡献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当中包括：李双龙、廖圣清、韩纲、李兆丰、朱春阳、郑征予、严三九等。

对于以下直接参与书稿写作的人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是：徐晖

明(总报告、广东卷)、王迪(黑龙江卷)、郑西帆(浙江卷)、王玲宁(河南卷)、郑智斌(江西卷)、禹卫华(四川卷)、郭建斌、曹云雯(云南卷)、姚君喜(甘肃卷)。

最后,衷心地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研究项目和本系列丛书的“慧眼识珠”,尤其是责任编辑徐婵女士的睿智、耐心和宽容,使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尽管其必然还存在各种缺陷,期待广大读者的指正,但无论如何,作为撰写“中国发展传播学”历史长卷中的一页的尝试,我们尽力了,也问心无愧了。

2008 岁末

于沪上文化花园明珠苑

目 录

第一章 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背景	1
第二节 中国大陆在发展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研究设计	6
第二章 河南社会发展和大众传播概况	9
第一节 社会发展状况	9
第二节 媒介发展概况	17
第三章 河南调查对象概况	19
第一节 调查对象的人口背景特征	19
第二节 媒介拥有与传播活动状况	26
第四章 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分析	31
第一节 媒介接触和评价状况:报纸	31
第二节 媒介接触和评价状况:电视	52
第三节 媒介接触和评价状况:广播	72
第四节 互联网接触行为分析	84
第五节 非新闻类媒介接触行为分析	90
第六节 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特征分析	103
第五章 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人口特征	116
第六章 大众传播与信息认知	124
第一节 概观	124

第二节 大众传播议程与受众信息认知	128
第三节 大众传播与新闻信息认知	141
第七章 受众媒介接触和观念现代化	153
第八章 媒介内容分析	
——以报纸为例	159
总结	173
总编访谈	176
参考文献	190
后记	192

第一章

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 世纪末以来,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人类迎来了又一次传播革命。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传播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政府治理和社会结构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广大受众产生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又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实践发生着日益深刻的效应。在这样的情势下,探讨大众传播和国家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推动传播事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需,而且,其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对于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其理论背景是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的主旨,就是运用传播学的原理、方法,观察和总结发展中国家在传播领域中的经验及教训,指导和推动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事业的快速、健康成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其重点是,研究信息传播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

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以美国学者勒纳出版于 1958 年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起点,首次探讨了传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启发了罗杰斯、施拉姆等人,在发展传播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

勒纳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尝试建构传播与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

有两种相对立的社会系统,一端是传统社会,另一端是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里,他分析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指出了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勒纳认为,大众传播可以把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生动形象地传播给社会各阶层的大众,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媒介接触和态度改变的关系,他提出了传播具有移情(empathy)作用的概念,即大众媒介通过信息传播,使个人在突破了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了解到外部新事物之后,能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自己,由原有的某种角色转换为另一种新角色,成为有现代人格的新人。^①

施拉姆于1964年发表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这部发展传播学的早期经典著作,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以促进现代化。同时指出,“任何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本身必须改变……这正是现代传播对于经济发展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②。他从传播事业的三大功能出发,指出传播事业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实施正规教育。施拉姆强调了信息传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传播事业的发展同社会总体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相适应的,提出了改进传播状况、支持国家发展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部著作对后来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杰斯于1962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之一,并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和推广看作是特殊的传播形态。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变革多为受到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的影响而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因此,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创新和发明推广的过程。此后,罗杰斯及其同事在亚非拉地区分别选取印度、肯尼亚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进行了农村调查,1969年出版了《农民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一书。他们运用罗杰斯本人此前提出的“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理论,发现:农民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自身因素与媒介接触频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媒介接触频度又与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得出了大众传播发挥着现代化“催化剂”作用的结论。罗杰斯侧重于对个人层次的现代化研究,同时也注意到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及社会风气

① 裘正义:《大众媒介与中国乡村发展》,群言出版社1993年。

② [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强于个人特质的影响,但未能继续深入下去。^①

美国哈佛大学的英格尔斯对现代性的特征,通过归纳、量表、统计等方法,使大众传播与现代化的研究更具有操作性。英格尔斯特别强调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人的现代化被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引进作为现代化标志的科学技术、制度结构和管理方法等等并不困难,但如果这个国家“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先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② 英格尔斯认为,具有现代人格的人应拥有能接受新事物、顺应社会变革、主动获取新知识、乐于参与社会事务、不为传统所束缚、有个人效能感、相信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能力、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等 14 个方面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英格尔斯设计了个人现代性量表,细分为多个测量题目,然后用数理统计方法,在亚、非、拉美 6 个国家,对不同阶层 6000 人的观念和行為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1974 年结集为《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他在这项研究中发现,大众传播不仅与经济水平、教育普及状况、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现代化,而且可以独立影响人的现代性。

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即由现代化理论派生而来。上述学者研究发展传播之时,正值现代化发展理论之“旧的典范”即经典现代化理论兴盛之时。虽然上述学者所论述的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从个人层面看,现代化就是个人放弃传统生活方式,而逐步具有现代性的过程。从制度和社会系统的层面看,现代化则经常被等同于西化、欧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显然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系的。正如学者李斯颐所说,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爱森斯塔德等人眼里,当代西方国家属于现代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传统阶段,受系统论和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仿效和引进必须是全方位的,否则就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理论将传统与现代视作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在社会学发展阶段即可见端倪,从孔德的社会动力说、斯宾塞的社会类型论,到迪尔凯姆的机械组合与有机组合说,乃至韦伯的理性主义观等,都隐约可见这

① 参见李斯颐:《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② [美]阿力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 页。

种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标志的线性进化观。^①

20 世纪 60 年代,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现代化理论一度曾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推广应用,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一实践的结果给发展研究带来巨大冲击,随即出现了对前述古典现代化理论加以修正的“新现代化研究”。“新现代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框架更加完整、严密,它不再把传统看作是现代的对立面,而侧重揭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再认为落后国家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才能走向现代化,重视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在方法上也从高度抽象的类型研究转为对具体国家的比较现代化个案研究,强调不同国家对待自身传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新现代化研究”避免作出简单性陈述或仅提供单变量分析,反之,该研究注意到多重制度(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分析、多维度的发展路线,以及内外因素的互动。^②

与此相应,在发展传播研究领域,一些西方学者以及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仅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把理论成果付诸实施,发展传播的早期理论甚至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依据。但是,诸多发展项目在实践中的失败,使学者们重新思考早期的理论,逐渐认识到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传播实践应从本土、本地出发,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采取适应当地情况的措施。同时,强调把传播纳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重视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对传播的影响。尤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界把发展传播学置于一个更宏大、更复杂的背景下,出现了对其主导范式的修正及批判理论。

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虽不仅仅局限于传播与现代化的探索,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探讨大众传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具意义。上述在发展传播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们,都致力于研究传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且,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发展,还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批判地吸收现代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一方面,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高度重视人的观念、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等内在素质的作用,这依然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应充分了解、运用“新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例如,传统与现代并不一定表现为

① 参见李斯颐:《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71—80 页。

② 参见李斯颐:《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71—80 页。

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有些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但有些传统却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大陆在发展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程,未来将向什么方向推进呢?在中国大陆,发展传播学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界的视野,90年代取得了较大发展。除了在新闻传播类的学术刊物上介绍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之外,主要的进展体现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也就是说,有一批学者开始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围绕发展与传播的关系展开调查和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调查》(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载《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张学洪,载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媒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化观念的相关性研究》(闵大洪、陈崇山,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5辑1991年)、《新闻传播与中国现代化》(“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新华出版社1992年)、《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研究》(张学洪,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7辑1992年)、《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群言出版社1993年)、《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媒介·人·现代化》(陈崇山、孙五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传播与民族发展》(张宇丹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大众传媒与农村》(方晓红著,中华书局2002年)。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发展传播领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无论在理论或实践层面,都卓有成效。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研究者比较关注传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传播对人的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以及大众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二、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研究者比较关注农村发展与大众传播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集中于地区性的研究,或以某一专题为研究对象。

四、从研究方法看,除定性研究之外,开始逐渐运用定量方法,研究方法逐步规范、科学。

中国大陆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为发展传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丰富资料。但缺陷也比较明显,如理论性不强,方法较为单一,

各个项目之间的借鉴、关联不够,地区性项目、专题性项目较多,而全国性的项目几乎没有。尤其是由于媒介环境的巨大而快速的变化,我国媒介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真正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问题,绝离不开文化(包括各种制度)建设。当前,对国家发展的理解至少应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知识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均衡发展状况。如今,传播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使以往的研究成果时过境迁,必须结合当下,在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作出回应。

正是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立足本国的现实,并吸收各国的最新成果,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试图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

第三节 研究设计

河南调查作为“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置于全国调查的框架之中,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的子课题之一。这次调查,是我国传播学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一次发展传播调查。调查在全国的九个省市展开,包括上海、浙江、江西、广东、河南、四川、黑龙江、甘肃、云南,覆盖了东部、中部、西部,大城市、中小城镇、农村,入户访问 2830 个样本。本书是“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成果的河南分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发展传播研究,第一次对河南全省的传播事业、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及传播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得出了许多对当前工作富有参考意义的数据和结论,并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本次调查的范围,包括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具体地点分别为郑州(河南省会)、焦作和信阳,主要采用入户访问、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并结合媒体访谈、内容分析等形式展开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实证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深入访谈法。

本课题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总的框架和目标为:描述河南大众传播的总体状况,呈现大众传播活动较为重要的方面;把握河南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分析河南受众媒介接触行为与个人特征、信息认知、交往观念之间的关系,力图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思考其成因,并与以往的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以期发现规律、解决问题。

在分析前人成果的长短得失的基础上,根据本次研究需要,我们的设

计大致如下。

首先,确立研究方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受众的情况,包括各类人群接触媒介的种类、频度、时间、内容、动机以及对媒介的评价,主要采取入户问卷方式,河南省共获得有效问卷324份。

(2)传者的情况,即对各地的媒介负责人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郑州日报》总编、《信阳日报》正副总编、《信阳晚报》总编、《大河报》副总编、《焦作日报》总编等。

(3)媒介内容的情况,即对各地媒介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主要方法为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的报纸为《郑州日报》、《焦作日报》、《信阳日报》、《信阳晚报》、《大河报》。

其次,设计问卷和抽样。

(1)问卷。

总体状况:包括媒介拥有情况,以及从事各种活动的时间分配情况。这部分内容,作为考察各类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背景。

媒介接触行为:包括接触传统三大媒介的频率、时间、内容、动机及评价状况;网络媒介和非新闻类媒介接触情况。

信息认知状况:首先,选取了新近发生且媒体给予广泛报道的6条国内、国际新闻;其次,选取了河南三地媒体给予广泛报道、且与当地发展密切相关的4条新闻(三地共计12条),用以测量受访者对国内、国际及当地新闻信息的认知情况。

交往和观念状况:用以考察受众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创新意识、观念的现代化,其中,观念现代化量表由16题组成。

受访者的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户口、家庭人口数、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

(2)抽样。

作为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在抽样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地域而言,应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就经济水平而言,应包括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为此,我们使用了多阶段的抽样方法。具体如下:

根据所在地的经济区域和经济发展指标,确定了九个省市作为一级样本,河南作为中部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的代表成为一级样本之一。其次,在每个选中的省选择三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地级市,其中省会城市作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成为必选城市,如在河南选择了郑

州,另外两地即焦作和信阳分别作为省内中等发展水平和低发展水平的代表,一道构成二级样本。再次,在作为二级样本的省会城市的全市所有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三个居民委员会;在非省会城市中,分别在首府所在地随机抽取一个居民委员会,在其下属一个中等发达县的县政府所在地随机抽取一个居民委员会,在该县所辖一个中等发达乡镇随机抽取一个行政村,由此构成三级样本。最后,在三级样本中,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各随机抽取 35 个家庭,入户访问时,再根据生日法确定最终的受访者。

需要说明的是,依此抽样,结果是城乡人口比例约为 3 : 1,较偏重于城镇。而实际情况是,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其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 3 : 1。因此,在进行城乡比较时,必须采用加权方法。

最后,实施调查及其他。

(1)访员入户访问。在调查区域,招募当地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担当访员,进行培训,每个访员的入户数量为 5—10 个。

(2)媒介内容的抽样分析(详见第八章)。

(3)媒体访谈(详见附录)。

(4)数据的输入、统计和分析,均采用 SPSS11.0 版软件。

河南调查于 2002 年 12 月底展开。

第二章

河南社会发展和大众传播概况

第一节 社会发展状况

河南地处中原,省域面积 16.7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 17 位,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74%,是一个农业大省。河南有 17 个省辖市、1 个省直管市,21 个县级市、89 个县、48 个市辖区、2123 个乡镇。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人口达 9256 万人,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其中,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 3 : 1。

从政区和交通地位看,河南处于居中的位置,其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全国经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河南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因此,古人称“得中原者得天下”。

然而,在东部崛起,经济腾飞,而今又提出西部大开发的规划之际,中部的河南却处于一个似乎被遗忘的地方。这里,从当地统计资料中,选择与本课题相关的指标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这些指标,主要是与我们的调查时间大致相同时期的资料,以供参考和比较。

一、河南省社会发展总体状况

河南 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 6163.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282.00 亿元,增长 4.5%;第二产业增加值 2953.33 亿元,增长 11.5%;第三产业增加值 1927.82 亿元,增长 10.0%。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1.9 : 47.1 : 31.0 变为 20.8 : 47.9 : 31.3。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1%,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6.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7%,居住价格上涨 0.1%。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 0.8%。